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任平
自选集

任平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任平
自选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平自选集/任平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 6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第 1 辑)

ISBN 978-7-80729-634-8

I. 任… II. 任… III. 哲学—文集 IV. B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2852 号

书 名 任平自选集

著 者 任 平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9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634-8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3—80237871)

总序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江苏，地处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下游，千百年来，她不仅汇聚着奔涌不息的一江春水，更孕育了代代学界巨擘。从言子、枚乘、董仲舒，到范仲淹、王艮、冯梦龙、金圣叹、顾炎武、王念孙、阮元、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再到柳亚子、顾颉刚、费孝通……一个个宛如耀眼的繁星，辉映在历史的长空，汇聚成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正因有了众多学术大家和他们的创造，江苏被世人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堪称当之无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江苏学人秉承前辈优良的治学传统，孜孜不倦，奋力耕耘，创造了大量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谱写了上个世纪后半叶江苏学界辉煌夺目的篇章。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与学术精华，当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自1999年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用5年时间，组编并相继出版了《当代江苏学人丛书》。该丛书以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苏籍著名学者为收录对象，多角度、较全面地反映他们的家世生平、治学经历、学术成就、道德修养和生活情趣。这套由近50部书组成的学人丛书，不仅成为弘扬江苏人文精神，展示文化强省建设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科学知识普及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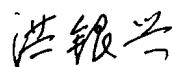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收录的对象大多已经辞世，少数健在者也都过了古稀甚至是耄耋之年。面对如此状况，有人不禁会问：曾经群星耀眼的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会不会后继乏人？让我们颇感欣慰的是，当历史跨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回应实践对理论的急切呼唤，进一步繁荣发展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社科界一批中年学者承继着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继续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并

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或着眼于对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或着眼于对中华民族发展轨迹的历史追寻;或潜心于精深的学理探析,或专注于相关学科理论的系统爬梳。其思想观点之丰富,学术见解之深刻,理论原创性之显著,令学界刮目。可以说,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一批学术带头人正在崭露头角。面对这一喜人的局面,在我的提议下,2009年初召开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编辑出版《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的决定。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实施的“人文江苏系列研究”工程的重要项目,计划用5~8年的时间,出版数十部。这套丛书与前述那套丛书有所不同,她是以现今活跃在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为收录对象,以“自选集”的形式选编其在国内具有权威性或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体,这些论文应当能够体现其研究的学术成就和水准,曾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对推动所属领域的学科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同时介绍他们治学的心路历程、经验体会以及收录他们全部论著的目录。组织编辑出版《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既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当今江苏学人的成果和风采,也是为了激励他们继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还是展示近些年来江苏文化大省和社科强省建设的成就。

诸事成功,人才为基。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局面,创造哲学社会科学新的辉煌,星星点点的学者群体显然力不从心,而是需要愈来愈多的社科工作者凝心聚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热忱点燃智慧的火炬,实现科学文化一代接一代的薪火相传。正因如此,我们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相对长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套丛书推介这些学界成功者的学术品质、治学之道和人文精神,给后学带来深刻的昭示与启迪:面对异彩纷呈的商品世界,只要我们不为物欲所动,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起冷板凳,凭着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一腔赤诚,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开拓更加缤纷璀璨、洋洋大观的学术天地,一定能攀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峰巅。

浩浩江流,前浪后浪。我们不仅仅期许有更多的学者和他们的成果入编丛书,而且格外希望在各种学术活动中不断增添新面孔,汇聚新生力量,壮大学术队伍——也许江苏新一代学术大师就在他们中间诞生。



2010年1月

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的探索^①

(代学术小传)

作者简介:任平,籍贯江苏省高邮市,1956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1977年,进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政治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1983年,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研修“西方马克思主义”。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97—2001年,在职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1988年被破格聘为副教授。1993年被聘为教授。现为苏州科技大学副校长,兼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参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哲学组成员,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市社科联副主席。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版《广义认识论原理》、《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的哲学》、《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时尚与冲突》等学术专著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3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曾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多次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先后获得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并获得“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领军人才”、“教学名师”、“江苏省优秀社科工作者”等称号。

^①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名家访谈”栏目,收入本书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做了修改。

作为人文学者学术的在场方式和主要标志,论著既为“文中历史”,更含“笔下人生”。前者指本书不是符号与意义的封闭结合,而是 30 年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哲学表达;后者指笔者置身于这一历史时期,从一个青年学者成长至今的心路历程。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接受哲学启蒙纯属时代使然,却因此成为我一生的选择。我的父母属于那种“有文化”的军人。上个世纪 60 年代,从部队转业后,父亲曾在一所苏北农科大专院校任党委书记,母亲则任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于是,除了马、恩、列、斯、毛的选集外,家里就有了几本后来被称之为“苏联红色经典”之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还有一本厚厚的苏联版《哲学辞典》,艾思奇本及孙叔平本的教科书更是一应俱全。在那个时代,其他的精神生活极其贫乏,而“火热的”政治生活和哲学思考成为时代轴心的两极,早年就在我的人格深处贯穿,并成为影响我一生的重要因素。翻阅这些哲学书籍帮助我度过了艰难的“文革”岁月。即便在 1972 年底高中毕业后不久成为一名农场知青,几卷马列著作,两本康氏教科书、苏联版《哲学辞典》也随身相伴。劳作之余,青灯黄卷,虽苦犹甜。进入大学,我获得了系统学习哲学的机会,几乎翻遍了当时在学校图书馆可能找到的中外哲学书籍,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所写的 50 余本哲学笔记,约 700 多万字。漫游于哲学世界,与古今智贤对话,可以提升境界,通晓世道,益智养心。在我看来,哲学决不是脱离生活、一劳永逸的僵死的知识集成,而是有生命的灵魂。一种哲学就是一种精神的历史存在方式,它不断进入历史生活的底蕴,有能力不断选择新的出场形态。如果说,我的青少年时代与哲学结缘多半出于无奈,那么,与许多同时代学者一样,受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催化,从变革生活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观念,不断冲刷我内心的传统哲学底色,这一变革促使我自觉地走上哲学创新之路。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不仅就其精神、而且就其方式都与世界相互作用。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大都经历了所谓“教科书改革的时代”洗礼。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哲学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摇篮。除了著名的“艾(思奇)本”外,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的“肖(前)本”、“李(秀林)本”、“陈(先达)本”等都是“教科书改革时代”的标志性成果。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当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

究生时,正是这一时期的巅峰年代。“教科书改革的时代”有两个基本命题,它们也同时构成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一个命题是“哲学内容的时代化”,特别强调哲学与时代及时代精神的内在关联,努力颠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僵化理解,以反思时代本性、解答时代问题的方式来推动哲学形态的变革,提出了“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哲学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哲学”关系的研究。这一充满时代气息与创造活力的哲学变革,包含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我影响至深。由此而来,有两件事开启了我真正的学术生涯。一是在积极参与李秀林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组工作过程中抛弃了形上玄思之路,真切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旨在如何“改变世界”、如何聚焦当代现实。1985年2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行为方式的变革”的文章,被《新华文摘》题封并全文转摘,成为激励我走高端学术道路的重要起点。二是在此起点上,我做了一个长达15年、分为三期的学术研究计划。第一期,1986—1990年,以哲学方式反思重大时代问题、专治中国现代化问题;第二期,1991—1995年,选择后现代思潮为主要对象,广泛开展与西方当代哲学的对话;第三期,1996—200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未来路径研究。不管后来的风云变幻,15年中我以相当严格的方式执行了这一计划,进而完成了我学术人生的深刻蜕变。

“教科书改革”的另一命题就是“表达方式的教科书化”,这无疑是“路径依赖”的产物。长期以来,教科书成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话语形态,研究成果能否进入教科书、能否将创新成果以教科书方式表达,一直成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的全国各大学关注的焦点。所以,围绕教科书改革,全国成立了几个重大课题组,召开了若干次学术会议,但终因学者们的见解已出现多元化倾向而难以统一。两大命题之间的理论旨趣显然是对立的。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分歧再也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教科书话语体系来实现形态变革与创新的初衷。于是,“教科书改革时代”被“后教科书时代”所取代。这一时代转换了研究范式,也有两个标志:一是出场路径的变革,即不再以统一的教科书,而是以自己的学术专著来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出场形态的变革,不再追求大一统的体系理解,而是深入探索过去被忽视或未开垦的领域如“价值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等等,被称之为“小体系时代”。尽管分门别类的研究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更贴近了生活世界,但依然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形态。因此,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新理解。

二

回眸以往,我的学术在场的踪迹显示:原初“一分为三”的阶段性计划竟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

从哲学地反思重大时代问题、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到创建发展哲学博士点学术方向,再到明确为“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划出了我学术人生的第一道弧线,也因此成为我哲学研究的第一脉络。我曾经从事了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教学,对“文本学研究”的思维范式有颇多感悟。而面向实践世界本身,首先包括了一个哲学立场和哲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从“体系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这又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实践所使然。以往历史的停滞源于思想禁锢,需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在这一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起点上,哲学变革成为了历史变革的先导,成为全民族关注的时代骄子,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但是,思想禁锢一旦解除,经济历史按照自己的轨迹自行展开,仍然按照教科书构想体系的哲学却发现自己与变革的时代实践道路之间渐行渐远,日益被边缘化。这不仅仅是地位的失落,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偏离。而任何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当是脱离实践、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思辨,而应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改变这一状况,杀出重围,在“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现代化的哲学”和“哲学的现代化”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时代口号鼓舞下,李秀林教授带领我们从事“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的课题,不仅希望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对中国最大实践即现代化问题做出创新解答,更希望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创新研究路径和范式。基于这一学术情境,在1995—1990年间,我一改过去从事“马克思主义原著”教学所秉持的“文本学研究”路径,转向实践的“反思的问题学”,分若干专题深度探索。1988年,我主编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悄悄的革命——主体、文化、价值的变革》,做了在大变革时代以文化激进主义立场重新勾画现代化图景的哲学尝试。在《光明日报》、《江海学刊》、《人文杂志》等发表的20余篇论文,集中对中国变革的制度主义、文化机理做了深度哲学阐释。研究的结果不仅使我们对转型变革的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更深切的哲学理解,而且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和形态的变革,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思路。

变革研究方式和形态、推动理论创新的工作往往需要借助于学科化路径来实现。以新学科方向的开设来表现这一变革的探索是当时唯一可能的方式。从

1985 年起,在崔绪治教授带领下,苏州大学率先在全国开设“管理哲学”方向,崔教授因此而成为“中国管理哲学之父”。之后,一大批新方向陆续开设,其中包括我主持至今的博士点——发展哲学和政治哲学方向,就是这一研究脉络的继续。通过 20 年的学科建设,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硕士,而且将“反思的问题学”理论化、系统化,在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中创新地提出一系列“原创”理论:“新全球化时代理论”、“中国新现代化理论”、“中国环境支持理论”、“中国自主辐射型现代化理论”等等,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时空语境、独特模式和独特道路做了深度系统地阐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21 世纪发展哲学》、《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等 30 多种论著中所阐述的观点,成为今天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借助于发展哲学的创新理念,我们还完成了若干国家、教育部、江苏省和苏州市的重大发展战略课题,以实践检验我们的理论,让观念不断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发展哲学的理论旨趣并不仅仅为创建一种“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而是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成为“反思的问题学”的主要形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哲学反思,从“问题中的哲学”到“哲学中的问题”,才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体路径。

三

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的对话,借以实现理论创新,成为我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探索对话的启蒙可以追溯到我于 1982—1983 年间在复旦大学参加该校哲学系举办的为期一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修班,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颇感兴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我对福柯、德里达、巴特等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的专门研究,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与交往行动理论的重新理解、与后现代哲学对话三者关联起来。我提出了“交往实践观”研究,即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意义的新理解视域,也作为与后现代哲学对话的理论支撑。1992 年,我主持完成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义认识论原理》一书,就是以交往实践观与后现代哲学对话的产物。不过,这一对话首先选择了认识论领域,其对以往单一主体性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在学界所引起的关注,遮蔽了对话的维度。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罗蒂等人在反对传统哲学以“主体—客体”两极模式作为“自然之镜”的幻象的同时主张主体际对话与民主,进而主张消解认识论,因此,如何将主体际关系纳

人认识论,进而改造认识论而不是消解认识论,就成为我与后现代哲学对话的焦点。《哲学研究》杂志开辟专栏,讨论我提出的“交往实践观”,长达一年半。

我提出交往实践观有三个思想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物质交往”思想的研究以及90年代初与后现代哲学的对话。在1999年出版的《交往实践与主体际》一书中,我提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变革的理论方案。我曾经说过,提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主要根据有三:第一,在一个高度全球化时代,主体际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哥德巴赫猜想”,非交往实践观难以解析。启蒙运动以来,“主体性哲学”、“主体—客体”模式一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开始,20世纪掀起的“实践哲学”转向,使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包括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实用主义等)都成为以实践、行动、生活世界为底版的哲学。然而,在全球化的催生下,一个问题也困扰着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解释学到后现代哲学,这就是主体际。全球化不断使“我”遭遇“他者”,在异质性、差异性主体之间需要建立交往与对话关系。于是,“问题中的哲学”就变成了“哲学中的问题”,成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之谜”当代版:在逻辑上,“大写的”、“第一人称”哲学和作为主体的“我”似乎始终只能面对对象客体,我们何以可能面对另一个作为主体的“他者”?解答方式在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现象学中是绝望的,而列维纳斯只给出一个永恒存在、绝对不可消解的“他者”,伽达默尔强调“视域融合”和“效果史”,而阿佩尔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行动理论没有论证,直接给予。

其实问题的解答并不复杂。在我看来,交往实践是一个“主体—客体—主体”的三式结构。其中,每一个主体都直接面对中介客体,因而多元主体可以对峙而立,使之在逻辑上成为可能。第二,与主张“主体—客体”两极模式的现代哲学及崇尚“差异化”、“多元化”和主体际哲学的后现代哲学对话,非交往实践观不能超越。“交往实践”的三式结构一方面汲取了现代哲学(主体—客体)与后现代哲学“差异性多元主体”或主体际关系结构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又扬弃了两者的缺陷:现代哲学的单一主体性与后现代哲学无客体底版的多元主体,成为超越两者的新理解。第三,融会中哲、西哲、马哲而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当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人伦哲学向度早在中国先秦哲学的儒、道、法、兵等诸子百家哲学思想中就大量存在,挖掘这些思想,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一个重任。

当年,“物质交往”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构建新世界观的一个核心概念,我们需要承接这些思想遗产。今天,“主体际”作为当代西方哲学一个轴心话题,表明

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因此可以成为融会中哲、西哲、马哲，面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当然，我的交往实践观研究需要有一个学术思想的“划界”，即要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日本学者广松涉的“事的世界观”等理论做一个必要的区分。

“交往实践观”核心概念的构建，当然需要深入思索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行动理论的关系。在我看来，根本差别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从“普遍语用学”出发，哈贝马斯将交往主要看作是一种“为达成相互理解的话语行动”，因而是精神交往与话语行为；而遵循马克思“物质交往”的思想，我认为交往实践是发生于多元主体间为了共同改造中介客体的物质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精神与话语交往不过是物质交往的产物，是更加“遥远的形式”。因此，我用“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来表明与哈贝马斯的哲学差别。第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先验地设定交往合理化的基本原则，而我的观点正相反：任何交往原则，都不过是交往行动本身的积淀，是后天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两者存在着根本不同的路向。至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广松涉“事的世界观”的差别，我在2007年赴日本参加第三届广松涉哲学思想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就阐明了基本差别。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本真意义上，我们共同强调主体际交往关系的重要性。而我们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他将交往关系看作最终结的本底，而我认为应当是交往实践活动，关系不过是活动的产物。如果强调关系结构的本原性，就难以摆脱结构主义的纠缠。

四

通过出场学研究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和创新意义，是我的第三个学术维度。的确，提出“出场学研究”是我学术道路的一次转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构建到更加注重背后的方法论探索、研究范式的批判，这是一次思想的深化。构建形态固然重要，但是对构建的原初语境和方法论考察更具有前提批判的性质。“范式”就是一种视野、规范、规则和方法论，它是一种见解、观点和理论的根基与灵魂。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进程就内地包括了范式变革的历史，出场学视域就是这一系列变革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当年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

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出场学视域就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内在地召唤出场学视域。把在一个时代语境中形成的理论形态僵化为“永恒在场”的“终结真理”，这是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根本幻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②，要求理论必须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重新选择出场路径与方式，与时俱进地创造新的出场形态。“与时俱进”贯穿着一种出场学视域，它将人们对“原版”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思想形态的追问转换为一个“出场学问题”：任何马克思思想形态都不是现成在场、永恒不变的。它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作为问答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仅要考量“原版”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更要追问马克思思想出场形态背后的历史语境，将出场形态看作出场语境的时代性结果。因此，出场学研究着眼于把握两条基本线索、四大模块：第一条线索，即从马克思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变化分析入手。它包括：什么曾经构成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什么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具有怎样的“历史间距”？进而这一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对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语境的变化构成两大模块：作为“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周围感性世界”的资本全球化，以及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新全球化时代。第二条线索，就是从“当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形态、思想、理论的变化。两者之间出现“历史的间距”，就是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上的变化。“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构成的两大模块，与历史语境变化的两大模块的相互对应性，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学视域。正是在这一经纬线上，无论是“原版马克思”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都不应当被重新僵化地理解。因而，“回到”与“走入”就在“与时俱进”基础上达到视域融合和统一。因此，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旨在探索在差异化时空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如何不断选择自己恰当的出场路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进而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

我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路径有深度的依存性。任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文本的意义、理论表现方式、存在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就是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实践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所谓“两翼”，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及与各种时代思潮的对话。“一体”就是“改变世界”的实践路径。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主要在于摧毁一个旧世界，那么今天更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进而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我们需要确立的出场学观念是：马克思文本意义、文本形态、理论形态是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理论表现。无论我们是追问马克思思想的以往形态还是当代形态，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文本的意义结构只是那一语境、路径中的相对历史形态，而不是无条件、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对文本意义结构的理解，也不能舍弃语境和路径来孤立地加以研究。随着语境和路径的历史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也会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出场形态。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任何“普遍在场”或“永恒在场”的可能性不过是不断出场的持续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需要在历史的和地域的差异境遇中不断出场，从而造就新的出场形态。

遵循这一思路，我领衔的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研究：其一，进一步突显“改变世界”的理论品格，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当代语境和中国语境的研究。“我们的时代”是当代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历史基础，对当代中国重大实践问题的哲学反思，特别是对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安身立命之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改变世界”实践的“第一要务”，因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场的当代语境，也因此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一种哲学如果强调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实践、走向人的生存，在今天就不可能不与发展实践这一中心相关联。正是发展凝聚着全体中国人对改善生存状况、走向美好生活的愿景，负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也因此成为“发展哲学”辉煌出场的历史舞台。其二，更加突显出场学视域的创新价值。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提出评判“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的三条标准：能够吸纳旧纲领中一切不受反驳的成分；能够合理地解释旧纲领难以解释的反常

事实；能够更有效地预见新的事实。我想出场学也应当具备这些特点。出场学并不是简单地消解其他研究范式，恰好相反，它强调其他研究范式的合理价值，但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能够在出场语境、路径的变化中来把握文本意义、展开对话、构建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出场学才能成为一种具有中国原创风格的研究范式。

目 录

总 序	洪银兴(001)
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的探索(代学术小传)	(001)

第一编 反思的问题学:建构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

马克思“反思的问题视域”及其当代意义	(003)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010)
21世纪发展哲学:主题、模式与趋向	(020)
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	(027)
走向新现代性的科学发展观	(038)
生态伦理学何以可能	(048)
“空间的正义”:当代中国可持续化进程的基本走向	(066)
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公共哲学	(072)
哲学研究:如何走向全球网络化时代	(079)
建设一个良序治理的差异性社会	(084)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	(095)

001

第二编 批判性对话:超越后现代地平线的交往实践观

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111)
-------------------	-------

交往实践观：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视域	(130)
辩证法：交往实践的转向	(145)
新全球化时代、交往实践观与21世纪哲学走向	(155)
交往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全球正义视域的哲学基础	(162)
常识分析：与后现代哲学对话	(174)
理解与共识：与后现代哲学对话	(185)
划界思维：哲学发展的重构机制	(194)
游戏政治观：后现代政治哲学分析	(204)

第三编 出场学视域：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213)
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两个循环	(222)
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	(232)
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	(244)
《共产党宣言》的当代启示	(256)
论恩格斯理解哲学革命的出场学视域	(269)
论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统一性	(279)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路径	(292)
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305)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及其当代启示	(314)
任平论著要目	(327)
后记	(336)